

# 援助结构、领导力与产业扶贫绩效

于滨铜, 王志刚, 朱佳, 侯云潇

**[摘要]**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层扶贫干部作为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实践抓手,其领导能力对建设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援助结构视角分析了扶贫干部领导力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建设和扶贫绩效中发挥的作用。通过构建区域经济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陷阱”和有效率的S型援助结构,剖析了领导力对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基于连片特困地区3省27县125家随机抽样合作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入与资金援助相互嵌入的援助结构和改善深度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领导力扶贫在中国减贫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扶贫干部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贫困程度越深,其促进效应越大;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存在着以市场开发、产业学习和行业合作为主的中间行为机制;在贫困地区发展早期,对人力资本援助改善的投入率应高于资金援助的投入率,否则容易陷入“福利陷阱”;发展中期反之,否则容易陷入“内卷化”陷阱。本文论证了中国驻村干部制度在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制度贡献,从制度改善和援助结构角度为实现“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发展思路,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制度路径。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 领导力; 产业扶贫; 援助结构; 贫困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1)06-0023-19

## 一、引言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脱贫攻坚战役中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既是人类扶贫史上的重要壮举,也是世界减贫事业的巨大奇迹(汪晨等,2020)。在此背景下,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

**[收稿日期]** 2020-08-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基于目标导向的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研究”(批准号71841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与风险交流策略研究”(批准号71633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食品安全城乡差距效应的测度、形成机理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批准号71773136)。

**[作者简介]** 于滨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朱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侯云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通讯作者:王志刚,电子邮箱:ohshigo@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决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为中国贫困地区建设规划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提供了进一步的战略方向。

从划归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治理的主战场到提出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的精准扶贫思路,从打好全面脱贫攻坚战役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针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制度与建设模式在实践中做出了重大工作创新与机制创新。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建设实践中,不仅向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电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援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资金援助,更是向贫困地区输送了大量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干部人力资本支持,着重调配至深度贫困地区进行帮扶建设。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和产业扶贫的带头人,他们对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推动全面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现有文献鲜少研究扶贫干部领导力对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针对领导力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力在减贫治理中的贡献。Kuada(2010)基于文化背景视角分析了非洲地区领导力对发展绩效的影响。Maak and Stoetter(2012)针对巴拉圭地区研究表明,社会企业家的领导力在推动社会基金扶贫、消除当地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Liu and Makoto(2010)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领导力对构建区域知识网络及其减贫绩效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驻村干部帮扶制度作为减贫制度的一大创新举措,学术界基于第一书记“先锋”角色和派出单位“后盾”作用,分析了其对农村减贫的治理效果,发现帮扶绩效与其派出单位、职务职级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倪大钊等,2020;Park and Wang,2010)。二是第一书记扶贫开发的治理模式与行动机制。第一书记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在村庄界面上汇聚和融合,形成了“接点治理”“双规治理”等工作模式,通过人力资本下沉赋能扶贫资源利用,提高了资源配置和扶贫方式的灵活性(谢小芹,2016;谢小芹,2017;杨晓婷等,2020)。当第一书记领导力较高时,可通过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建立公共权威促成扶贫目标的集体行动实现(舒全峰等,2018;Ostrom,1990)。三是驻村干部扶贫治理的行动困境。一方面,驻村干部下乡帮扶仍存在领导力供给不足、原生村庄排斥、村镇干部垄断等的制约(王亚华和舒全峰,2017);另一方面,帮扶工作存在以提升治理之名行下基层“镀金”之实等治理困境,使扶贫治理悬浮化,偏离了领导力帮扶的初衷(张国磊和詹国辉,2019)。

进一步地,对于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探讨伴随着经济学发展的始终。Smith(1776)基于自由市场调节理论,认为贫困源于个体在市场环境下的懒惰行为。Lewis(1966)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出发,指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者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贫困文化,由此解释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与之相对,Schultz(1961)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家庭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投资不足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匮乏。在此基础上,Sen(1981)进一步提出可行能力理论,指出贫困不应仅停留在收入层面,其根源在于贫困者缺乏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可行能力”。在此背景下,Sherraden(1991)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认为资产缺乏是导致持续贫困的根源,不仅包括货币等有形资产,还包括声誉、信任和社会网络等无形资产。Banerjee and Duflo(2012)对反贫困主流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反思,指出资金援助并不必然带来脱贫绩效,摆脱贫穷陷阱的关键在于引导贫困者将资金援助用于生产和投资,否则更高的外部援助反而易助长其依赖性。

综上,现有文献从多角度出发剖析了贫困的根源与治理路径,并从领导力在国际反贫困中的作用、中国驻村干部制度优势和行动困境等角度对领导力扶贫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三点局限:一是针对领导力扶贫的相关研究多基于经验分析和质性研究,尚未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二是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干部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研究鲜少,未能深入

探究其贡献效应与作用机制。三是未能充分关注援助结构对扶贫效率的影响。在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中,不仅对产业扶贫提供了大量专项资金援助,更是投入了大量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人力资本援助,形成资金—人力资本的二元援助结构。然而,现有文献并未充分考虑援助结构对援助效率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领导力扶贫的援助结构理论。通过建立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和人力资本产出方程,论证了在深度贫困地区采取加大领导力与人力资本投入的援助结构是更有效率的。并且,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扶贫示范试点3省27县的合作社大样本随机抽样数据,实证测度基层干部领导力对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作用机制及其与贫困深度的相关性。

本文基于中国扶贫情景,证明并发展了Banerjee and Duflo(2012)的贫困陷阱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援助结构分析视角。并且,从该理论视角出发,与Schultz(1961)内生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应,论证了具有中国经验的外生人力资本援助即驻村干部下乡与领导力扶贫对大规模减贫治理的突出贡献作用。具体边际贡献在于:①理论论证和定量测度了深度贫困地区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并进一步阐释了其贡献效应与贫困深度的相关性,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启示;②厘清了领导力促进扶贫绩效的行为机制,即基层扶贫干部究竟通过何种有效的管理行为和经营决策促进产业扶贫绩效实现;③揭示了扶贫开发治理中资金援助与人力资本援助的结构优化规律,即伴随贫困深度增加或贫困地区发展,采取怎样的资金—人力资本要素援助结构是更有效率的,提出了贫困治理中的“贫困陷阱”与“福利陷阱”。

## 二、理论剖释:援助结构下的领导力贡献

### 1. 区域“贫困陷阱”与有效率的援助曲线

相对于一般贫困与非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在自然资源、市场环境、经济意识、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特殊弱质性:①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发展资源极度匮乏。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石漠化和沙漠边缘地区,以及区位条件较差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其自然资源匮乏,地理环境恶劣,缺乏发展现代农业、工业的产业基础。②市场化程度极低,商品经济和投资意识淡薄。恶劣闭塞的自然环境和极度贫乏的要素资源使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多保持自给自足生产方式,鲜少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与物资交换,农牧业生产率和农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居民市场经济意识淡薄,注重当期消费,缺乏生产投资意识,严重阻碍了增收步伐。③人力资本极度匮乏,劳动力流失严重。深度贫困地区受制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风俗习惯,人们思想观念落后、受教育水平很低,无论是知识、技术、能力方面,还是健康、体质、活力方面,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都显得极度匮乏,且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难以满足产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素质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本援助成为帮扶其走出贫困的关键途径。资本援助是指向贫困地区或受援对象提供包括货币、实物、人力资本等在内的生存与发展援助,用以解决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与社会问题,促进受援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包括资金援助和人力资本援助。资金援助主要是指向受援对象提供货币、实物等,用于受援对象的生产创造活动;人力资本援助是指向受援对象进行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派遣专家、管理人员、技能劳动力等高素质人力资本帮助受援对象开展援建活动。然而,对于世界各国的反贫困研究表明,资本援助并不必然带来脱贫绩效,较高外部援助背景下贫困地区依然可能陷入发展停滞的“贫困陷阱”(Banerjee and Duflo, 2012)。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深度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三部门模型,剖释其极易陷入“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与循环机制,进一步分析援助结构视角下扶贫干部领导力在摆脱“贫

困陷阱”、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提升产业扶贫绩效中的贡献效应。

(1) 贫困农户。假设在一个无限期的生产周期内,存在一个连片特困地区,该区域内主要群体为贫困农户,其每期的消费为  $c_t$ 。不失一般性,假设农户每期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来自政府扶贫资金的转移支付  $TR_t^1$ ,二是农户入股合作社的分红收入,三是农户参与合作社提供的就业岗位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假设农户每期持有的资本为  $k_t$ ,其资本来源主要包括扶贫资金的“三变”改革<sup>①</sup>和农户的家庭储蓄。同时,设合作社每期提供的分红利息和劳动工资分别为  $r_t$ 与  $w_t$ ,贫困农户在合作社的务工时间为  $n_t$ 。在此背景下,假设贫困农户效用函数为  $u(c_t)$ , $\gamma$  为跨期消费的贴现率, $\delta$  为资本折旧率。基于此,贫困农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max \sum_{t=0}^{\infty} \gamma^t u(c_t) \quad (1)$$

$$\text{s.t. } c_t + k_{t+1} \leq w_t n_t + r_t k_t + TR_t^1 + (1-\delta)k_t \quad (2)$$

(2) 扶贫合作社。不失一般性,假设在该区域内,在扶贫专项资金的帮助下建立起产业扶贫合作社。该合作社的主要职能在于,吸纳扶贫资金与农户资本,进行特色农产品经营和提供就业岗位,从而进行产业扶贫。假设合作社生产函数为  $F(K_t, L_t)$ ,主要依托资本  $K_t$ 和劳动  $L_t$ 进行生产。设农产品在各期的价格为  $P_t$ ,政府对合作社每期的援助资金为  $TR_t^2$ 。同时,基于合作社属于法人经营性质,每期应向政府缴纳部分税费  $T_t$ 。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的绩效最大化问题为:

$$\max P_t F(K_t, L_t) - w_t L_t - r_t K_t + TR_t^2 - T_t \quad (3)$$

(3) 地方政府。不失一般性,假设该地区地方政府进行区域经济调控,主要职能是负责扶贫资金的合理调度使用与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地处深度贫困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扶贫专项资金拨款与地方税收收入<sup>②</sup>。基于此,假设地方政府在各期所获得的扶贫专项资金为  $H_t$ ,公共服务支出为  $G_t$ ,则政府在每期的财政收支方程为:

$$TR_t^1 + TR_t^2 + G_t \leq T_t + H_t \quad (4)$$

当区域经济实现均衡时,联立各部门预算约束,可得该三部门经济均衡运行的预算约束为:

$$c_t + k_{t+1} + TR_t^2 + G_t \leq w_t n_t + r_t k_t + T_t + H_t + (1-\delta)k_t \quad (5)$$

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均衡需同时满足产品市场出清  $c_t + k_{t+1} + G_t = F(K_t, L_t) + (1-\delta)k_t + H_t$ 、劳动市场出清  $L_t = n_t$ 和资本市场出清  $K_t = k_t$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立目标函数与三部门均衡的预算约束,解得该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实现均衡时存在如下欧拉方程:

① 农村“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即贫困农户将土地和扶贫资金作为股本加入合作社,获得合作社分红收益。在笔者深入连片特困地区进行的为期两年的监测调研中发现,扶贫专项资金入股和土地入股是贫困农户最常见的资本入股和投资方式,由此获得资本的利息性收入。如四川大凉山区彝族自治州、贵州乌蒙山区和甘肃六盘山区等。而贫困农户入股合作社获得分红收益,同时在合作社内进行务工获得工资性二次收入,也是深度贫困地区较为常见的产业扶贫方式。

② 连片特困地区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托各级财政拨款,如来自中央政府、世界银行、省项目办等下拨的各类扶贫专项资金。税收收入仅占其财政收入的极小一部分,部分县区的年税收收入甚至仅约 1000 万元。在此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合理调度、使用扶贫专项资金发展产业扶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等。

$$\frac{u'(c_t)}{\gamma u'(c_{t+1})} = P_{t+1} \frac{\partial F(K_{t+1}, L_{t+1})}{\partial K_{t+1}} + (1-\delta) \quad (6)$$

不失一般性,假设贫困农户效用函数为 CRRA 风险效用函数  $U(c_t) = (c_t^{1-\theta} - 1)/(1-\theta)$ , 合作社生产函数为 C-D 函数  $F(K_t, L_t) = AL_t^\alpha K_t^\beta$ 。其中,  $\theta$  为风险规避系数,  $A$  为技术进步系数,  $\alpha$  和  $\beta$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基于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性, 本文做出如下三点有效性假设: ①由于深度贫困地区早期资本工业发展缓慢, 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因此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对高于资本的产出弹性(邓宏图等, 2018), 即满足  $0 < \beta < \alpha < 1$ 。②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多数将大量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购买和基本服务支出, 其消费可行域相对固定, 消费观念相对保守, 投资意识较为淡薄。因此, 假设其消费偏好更注重当期消费, 即当面临收入增长时会将相对更高的比例用于当期消费而非投资。③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环境恶劣, 生活条件较差,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城打工, 使深度贫困地区面临劳动力流失困境, 即  $L_{t+1} < L_t$ 。

基于此, 代入(6)式区域经济均衡运行方程, 则有:

$$K_{t+1} = \left[ \frac{\frac{1}{\gamma} (c_{t+1}/c_t)^\theta + \delta - 1}{P_{t+1} A \beta L_{t+1}^\alpha} \right]^{\frac{1}{\beta-1}} \quad (7)$$

进一步运算可得:

$$\frac{K_{t+1}}{K_t} = \left[ \frac{\frac{1}{\gamma} (c_{t+1}/c_t)^\theta + \delta - 1}{\frac{1}{\gamma} (c_t/c_{t-1})^\theta + \delta - 1} \cdot \frac{P_t}{P_{t+1}} \right]^{\frac{1}{\beta-1}} \cdot \left( \frac{L_t}{L_{t+1}} \right)^{\frac{\alpha}{\beta-1}} \quad (8)$$

由此可得两点重要经济学含义: ①由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农户重视当期消费而缺乏投资意识和积极性, 在政府转移支付等收入支持下, 短期内贫困居民的消费增长比率或将不断上升, 即满足  $(c_{t+1}/c_t) \geq (c_t/c_{t-1})$ 。此时, 在劳动力水平和产品价格各期保持不变情景下带来  $K_{t+1} \leq K_t$ , 即资本存量循环缩减, 使其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处于资本积累不断累退的低水平均衡之中,  $K_t$  不断沿运动轨迹向原点收敛, 从而陷入发展停滞的区域性“贫困陷阱”, 如图 1 所示。基于 Banerjee and Duflo (2012) 对于“贫困陷阱”的定义, “贫困陷阱”是指由于资本积累、发展观念的落后以及消费偏好的“及时享乐性”, 贫困群体无法产生用于发展投资的留存收益, 即“今天的留存总是小于昨天的留存”, 从而陷入发展性资本不断螺旋式下滑的贫困循环之中(见图 1)。此时, 资金援助并不必然带来脱贫绩效, 更高的外部援助反而易助长贫困农户的依赖行为。②由于深度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劳动力流失困境, 年轻劳动力一旦外出打工则不愿返乡劳作, 使得  $L_{t+1} \leq L_t$ 。在此背景下, 假设农户各期消费与产品价格保持不变, 伴随严重劳动力流失, 进一步传导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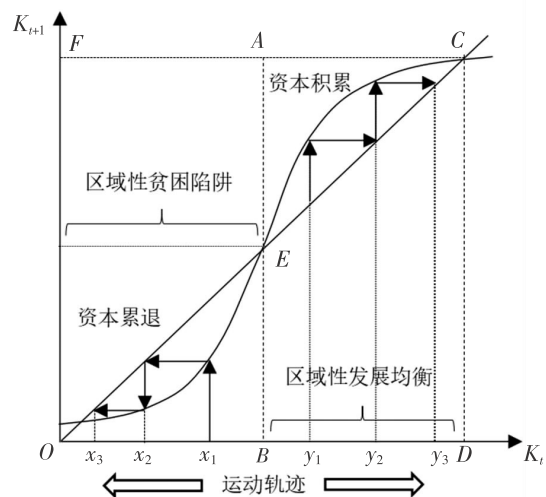


图 1 “贫困陷阱”与低水平均衡

$K_{t+1} \leq K_t$ , 这与投资意识淡薄所带来的效应方向相一致, 加剧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陷阱”。此外, 产品价格的上升, 即  $P_{t+1} > P_t$ , 将有助于促进该区域经济实现资本积累和走出“贫困陷阱”。

上述推演和分析证明, 即使存在各期资金援助  $TR_t$  的情况下, 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在劳动外流、消费偏好和投资意识方面的特殊性, 其依然易陷入发展停滞的“贫困陷阱”。为使其更好地走出低水平均衡, 在进行资金援助的同时, 应注重从劳动贡献率入手, 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援助投入, 改善其人力资本状况,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产出增长率, 打破资本累退的循环陷阱, 促使资本运动轨迹由  $ABOF$  向  $ABDC$  区间移动, 进入新的区域性发展均衡。

事实上, Banerjee and Duflo(2012)对单一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资金援助的反贫困主流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反思, 指出资金援助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 更高的外部援助一定情境下反而易助长贫困农户的依赖心理, 帮助其摆脱“贫困陷阱”的关键在于了解其思维 and 选择。因此, 对于贫困地区的资本援助, 应伴随一定的人力资本改善或人力资本援助。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产出率促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可以带动贫困地区农户意识转变, 提高其市场经济和投资意识, 激发其内生脱贫动力, 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提高资本援助效率。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资金和人力资本援助应呈怎样的援助结构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在空间向量中经济实现最快增长路径的分析思路, 假设深度贫困地区在发展初期, 其初始生产要素投入点为  $x^*(L_t^*, K_t^*)$ , 产量为  $F$ 。同时, 假设在  $x^*$  点可以选择任意要素投入配比的发展路径, 则  $F$  增长的空间向量方向为  $v$ 。为便于简化分析, 假设向量长度为 1, 即  $\|v\|=1$ , 重点讨论  $v$  处于何种方向  $F$  增长速度最快。那么, 在  $x^*$  点, 方向为  $v$  的产量  $F$  的增长速度为:

$$\nabla F(x^*) \cdot v = \begin{pmatrix} \frac{\partial F}{\partial L_t^*}(x^*) \\ \frac{\partial F}{\partial K_t^*}(x^*) \end{pmatrix} \begin{pmatrix} v_L \\ v_K \end{pmatrix} = \|\nabla F(x^*)\| \|v\| \cos\theta = \|\nabla F(x^*)\| \cos\theta \quad (9)$$

其中,  $\nabla F(x^*)$  表示  $F$  在  $x^*$  点的梯度向量。由于  $|\cos\theta| \leq 1$ , 当且仅当  $\theta=0^\circ$ ,  $\cos\theta=1$  时, 单位长度向量  $v$  之间的  $\nabla F(x^*) \cdot v$  取得最大值。由此, 当向量  $v$  沿梯度向量的方向移动时,  $F$  增长速度达到最快。此时, 梯度向量  $\nabla F(x^*)$  为:

$$\nabla F(x^*) = (\alpha A \alpha L_t^{*\alpha-1} K_t^{*\beta}, \beta A \beta L_t^{*\alpha} K_t^{*\beta-1}) \quad (10)$$

假设在  $x^*$  点劳动与资本的单位存量近似, 则位于  $x^*$  点, 使得  $F$  增长速度最快的劳动—资本最优要素投入比例  $I_t(L_t, K_t)$  为:

$$I_t(L_t, K_t) = \frac{\frac{\partial F}{\partial L_t^*}(x^*)}{\frac{\partial F}{\partial K_t^*}(x^*)} = \frac{\alpha K_t^*}{\beta L_t^*} > 1 \quad (11)$$

由此可得, 在深度贫困地区早期发展路径中, 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改善投入, 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提高劳动投入, 将有利于满足最优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 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达到最有效率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地, 伴随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投入不断增加,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劳动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将逐渐降低, 后一期的劳动边际产出  $MP_L^{t+n}$  不断下降, 使得人力资本在不断递减的边际水平上持续投入和产出, 最终使最优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变化为:

$$I_{t+n}(L_{t+n}, K_{t+n}) = \frac{MP_L^{t+n}}{MP_K^{t+n}} \leq 1 \quad (12)$$

在这一发展阶段,最优的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开始向资本倾斜。为进一步提高要素的边际产出,实现最快的区域经济增长,应转向从资本投入改善入手,加强对工业资本的投资援助,发展产业基础设施,提高工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入比例,以保持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同时,当方程两端等式成立时,最优要素投入组合将达到一定拐点。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效率的空间 S 型援助曲线,如图 2 所示。首先,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早期,对于人力资本改善的援助投入率应高于对资本改善的援助投入率,以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的产出潜力,实现最有效率的产出增长,如曲线 OA 所示。发展早期是指贫困农户市场经济和投资意识淡薄、注重当期消费、劳动力外流严重、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阶段。其次,在发展中期,当人力资本相对工业资本投入比例更高,使产出增长速度达到一定拐点(点 A),此时,对资本要素的援助投入率应高于对人力资本的援助投入率,以实现令产量增长速度最快的要素组合,如曲线 AB 所示。发展中期是指农户消费观念与投资意识有所改善、资本工业开始起步发展、区域经济的劳动水平相对较高但劳动的产出增长率趋于边界、产业基础设施仍相对薄弱的阶段。此外,当区域经济发展达到相对后期,对于人力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要素投入将达到相对合理的均衡状态(点 B),向空间 45°线接近,如曲线 BC 所示。发展后期是指区域经济的产业体系与就业市场相对成熟、区域内产业链开始形成、生产者市场经济与投资意识相对成熟的阶段。此时,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最优投入结构将取决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若早期对资本改善的援助投入率高于对人力资本改善的援助投入率,则有可能陷入“福利陷阱”,如图 2 中  $OIDA_3A_1I_1$  空间所示。“福利陷阱”是指在贫困地区发展早期,人力资本的存量与质量水平极低,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很弱,在面对大量资金援助的“资本福利”时,居民并不是将资本用于生产,更可能用于消费,反而易助长其“懒惰”情结,带来资金援助的无效率。这就解释了为何要“扶贫先扶智”的问题。若在其发展中期,对人力资本改善的投入率高于对资本改善的投入率,则易陷入“内卷化陷阱”,如图 2 中  $A_2A_5A_4B_4B_2B_5$  空间所示。“内卷化陷阱”是指较多的人力资本在较低资本存量水平上进行生产,使得劳动投入维持在较低的边际报酬水平上持续生产,进入高劳动投入与低边际产出之间的低水平均衡。这就解释了农业生产的“内卷化问题”。

中国 2011 年划归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正是处于生产方式原始、工业资本匮乏、劳动经营密集型和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发展早期。深度贫困片区的扶贫开发对人力资本援助改善需求或相对更高,若采取“主流扶贫观点”下投入大量资金援助的单一援助结构,更易使贫困片区陷入低效率的“福利陷阱”。中国对贫困片区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治理,采取资金援助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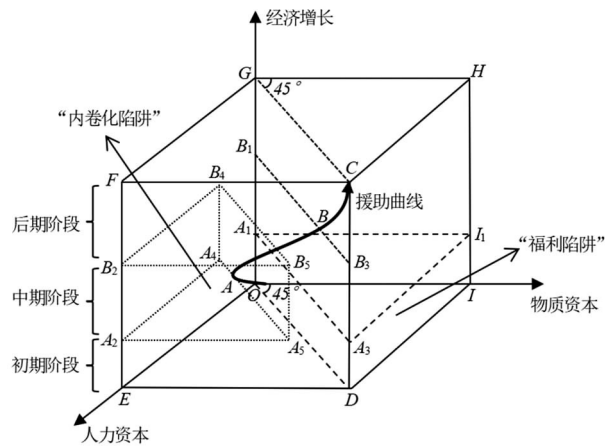


图 2 空间 S 型援助曲线

人力资本援助并重的开发治理方式,在针对连片特困地区援建大量交通、电信、产业基础设施和进行投资的同时,派遣大量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身于扶贫建设一线之中,在组织农户生产、发展地方产业、推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工作实践中,优于一般国家的要素援助结构,是中国扶贫开发治理的一大特色。而正是这种高效率的援助结构,满足了贫困地区发展早期对人力资本改善和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需求,从而能够实现与资金援助的最优要素组合,在更大程度上扩大资本援助的减贫效应,实现高效能的减贫和有效率的增长。

## 2. 领导力贡献:效应与机制

对于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援助通常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加强对教育、培训、医疗等方面投资,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现代化意识和体能素质等,扶持原生村庄人力资本成长与发展,实现“内生式”扶助;二是通过向贫困地区输送高素质人力资本,如援建专家、技能劳动力、扶贫干部等,补充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与质量,实现“外援式”扶助。进一步地,“内生式”扶助虽能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与水平,但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较长,难以在短期内发挥显著的扶贫绩效;然而,“外援式”扶助能够在短期内迅速补充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迫切需要,在脱贫攻坚任务中易迅速发挥扶贫成效。

中国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扶贫制度属于典型的“外援式”人力资本援助,但同时兼具“外援式”和“内生式”的功能特征。首先,对于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通常以村镇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单元开展产业扶贫,领导能力较强的扶贫干部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村民生产,科学做出产业发展决策,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与高效经营,实现“外援式”发展援助。其次,领导力较强的扶贫干部可以更好地带动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提升其自主脱贫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和投资意识,进一步提高其知识技能水平和人力资本质量水平。

基于此,本文将领导力引入人力资本产出方程,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探讨其对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不失一般性,假设深度贫困地区以合作社为单位开展村镇产业扶贫,其主要领导者理事长由第一书记、村支书等扶贫干部担任。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理事长领导力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因而可认为其对产出贡献的影响是内生的(Romer, 1986; Lucas, 1988),适用于指数法进行分析(程名望和张家平, 2019; 郝大明, 2015)。由此,设其领导力系数为 $\lambda$ ,作用于人力资本存量,则具有较高领导水平的合作社生产函数为:

$$y_l = A[(1+\lambda)L_t]^\alpha K_t^\beta \quad \text{s.t. } \lambda > 0 \quad (13)$$

而一般合作社生产函数仍为:

$$y_n = AL_t^\alpha K_t^\beta \quad (14)$$

其中, $y_l, y_n$ 分别为该两类型合作社的生产水平。为便于简化分析,假设市场完全竞争,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合作社的收入分别等于其劳动的边际收益,并通过收入水平来衡量其产业扶贫绩效(程名望和张家平, 2019)。两类型合作社的产业扶贫绩效分别为:

$$Income_l = \frac{\partial y_l}{\partial L_t} = \alpha A (1+\lambda)^\alpha L_t^{\alpha-1} K_t^\beta \quad (15)$$

$$Income_n = \frac{\partial y_n}{\partial L_t} = \alpha AL_t^{\alpha-1} K_t^\beta \quad (16)$$

领导力对合作社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  $C$  通过相对值表示为:



$$C = \frac{Income_l}{Income_n} = \frac{\alpha A (1+\lambda)^\alpha L_t^{\alpha-1} K_t^\beta}{\alpha A L_t^{\alpha-1} K_t^\beta} = (1+\lambda)^{1-\beta} \quad (17)$$

当  $\lambda > 0$  时,可以证明  $C > 1$ 。在此基础上,对领导力变量求偏导可得:

$$k = \frac{\partial C}{\partial \lambda} = \frac{\partial (1+\lambda)^{1-\beta}}{\partial \lambda} = \frac{1-\beta}{(1+\lambda)^\beta} > 0 \quad (18)$$

其中,  $k$  为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系数。结果表明,理事长领导力与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呈正相关,即较高的领导力水平能够显著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率与产出弹性、贫困深度之间的变化规律。推导可得:

$$\frac{\partial k}{\partial \beta} = -\frac{1+(1-\beta)\ln(1+\lambda)}{(1+\lambda)^\beta} < 0 \quad (19)$$

$$\frac{\partial^2 k}{\partial \beta^2} = \frac{\ln(1+\lambda)[2+(1-\beta)\ln(1+\lambda)]}{(1+\lambda)^{2\beta}} > 0 \quad (20)$$

由此可知,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率伴随着资本的产出弹性减小而增大。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早期,资本工业发展缓慢,生产方式秉承传统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的产出贡献相对较高,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小;而伴随贫困地区产业建设与工业发展,资本积累程度将会加深,产出对于劳动的需求会降低,资本的产出弹性将进一步上升(邓宏图等,2018)。因此,如图3所示,伴随贫困程度  $h$  的加深,资本的产出弹性  $\beta$  将相对更低,而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率会相对更大。即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一定程度上与贫困深度呈正相关。

进一步分析扶贫干部领导力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的能力结构和行为机制。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在特定组织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及利益相关者、充分调动人力资本与利用资源环境条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2006)在综合国内外学术观点、总结领导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五力要素组成的领导力模型:一是组织目标与战略的制定能力(前瞻力),二是吸引被领导者的能力(感召力),三是影响被领导者和情境的能力(影响力),四是正确而果断决策的能力(决断力),五是控制目标实现过程的能力(控制力)。该模型超越了时代、国别、组织类型、领导情境和追随者类型等条件,对领导力一般规律进行了较好概括,广泛用以指导各级领导者的培训和领导实践。基于此,本文以五力模型作为扶贫干部领导力的测度和分析框架,剖析其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扶贫干部基于领导力提升产业扶贫绩效的行为机制。

关于市场开发机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产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产品的市场表现,而理事长识别市场需求,拓宽产品销路以及开辟新市场的市场开发行为,是实现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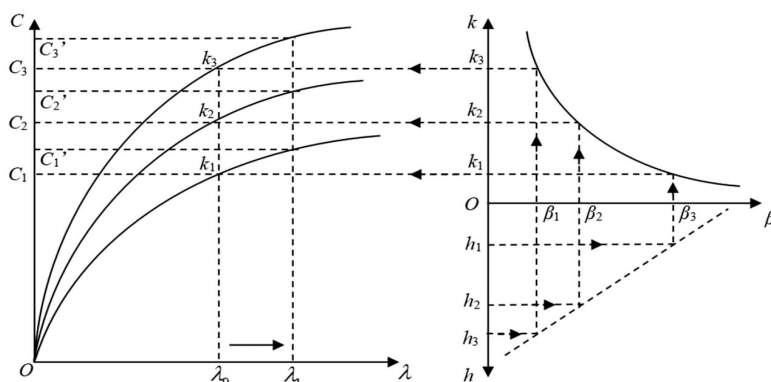


图3 贫困深度、领导力与产业扶贫绩效

社产业盈利与经营绩效的关键(曲承乐和任大鹏,2018)。与此同时,管理者领导力越强,组织创新行为越显著,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不断拓展销路的市场开发行为是其组织创新的主要内涵。因此,理事长领导力越强,市场开发行为越显著,并能通过市场开发行为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

关于产业学习机制。研究表明,管理者领导力越强,组织学习行为越显著,而从外部获取知识和经验、推动自身技术和管理方式革新的产业学习是组织学习行为的关键所在。同时,组织学习行为在领导力对组织绩效的促进效应中起重要的中间机制作用(陈国权和周为,2009;谢洪明等,2007)。由此推断,合作社理事长领导力越强,越有可能采取有效的产业学习行为,并能通过不断学习同行业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与经营经验,提高经营效能与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

关于行业合作机制。合作社理事长通过在合作信任与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同行合作关系,对促进其产业发展和提高经营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任胜钢,2010)。同时,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领导力越强,越注重为团队发展获取外界支持和与外部建立合作,通过组织间合作获取资源和支持,为团队营造支持型的外部环境(曹仰锋等,2011)。基于此,理事长领导力越强,越可能寻求行业合作机会,创造良好的支持环境,从而通过行业合作行为,有效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援助结构视角下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影响路径,如图4所示。基于人力资本—资金援助有效率的援助结构视角,早期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援助投入,能够针对性地帮助其走出“贫困陷阱”和避免资本援助的“福利陷阱”,提高资本援助效率。中国派遣大量的扶贫干部下乡帮扶,充分发挥了其领导力扶贫和人力资本援助贡献,并能够通过市场开发、产业学习和行业合作等扶贫开发行为机制,有效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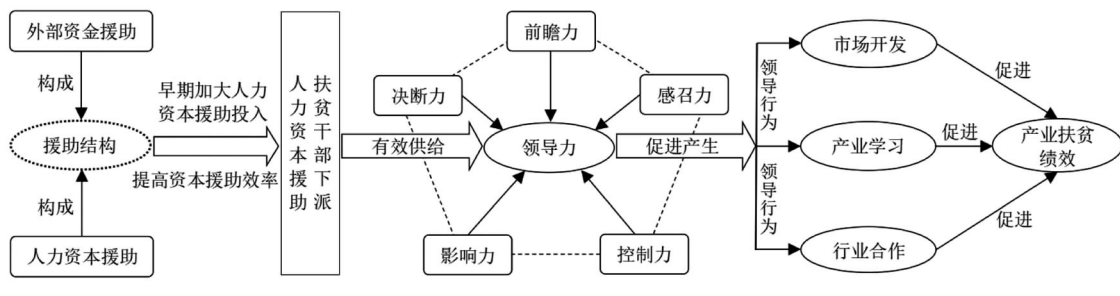


图4 援助结构背景下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影响

### 三、研究设计:估计策略与样本数据

#### 1. 模型设定

(1)领导力与资金援助对扶贫绩效的贡献估计。为准确估计扶贫干部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并进一步与资金援助的贡献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同时引入二者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基本形式如下:

$$Benefits_i = \alpha_0 + \alpha_1 Leadership_i + \alpha_2 Capital_i + \sum_{j=1}^n \beta_j Ctrl_{ij} + \varepsilon \quad (21)$$

其中,  $Benefits_i$  为第  $i$  个合作社的产业扶贫绩效,即带动农户增收的比例,  $Leadership_i$  为合作社理事长的领导力水平,  $\alpha_1$  即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系数,  $Capital_i$  为合作社成立期初的资本存量水平,由世界银行项目、国家扶贫项目等专项资金加总得到,即资金援助水平;  $\alpha_2$  表示资金投入对

产出的贡献系数; $Ctrl_j$ 表示同时影响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的第 $j$ 项控制变量, $\beta_j$ 表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alpha_0$ 和 $\varepsilon$ 分别表示截距项和随机干扰项。

(2)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扶贫绩效,且对于理事长领导力的测度采用主观量表评分法,可能存在如下三点内生性估计偏误:①遗漏变量问题。基于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因素众多且地方经营环境复杂,可能影响扶贫绩效的因素难以被完全观测和引入回归方程,因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遗漏变量问题。②联立因果关系。在进行专家量表评价时,监测人可能会不同程度地依据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的良好与否作为评价理事长领导力的事实依据,从而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的联立因果关系。③自选择问题。由于合作社经营策略与建设周期不尽相同,其产业扶贫绩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产业发展策略、建设周期与作物生长周期的影响,从而可能产生自选择问题所带来的测量误差,即产业扶贫绩效水平是合作社对发展策略主观选择的结果。

基于此,本文采用如下两种计量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工具变量法。为有效剔除遗漏变量、联立因果关系甚至测量误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理事长对村内每一户社员家庭的了解程度作为领导力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一方面,领导力包括感召、控制和影响被领导者与情景的能力,因而具有较高领导力水平的扶贫干部对各贫困农户的家庭状况与异质性特征应具有更程度的了解,能够关注和关怀被领导者的个性化特征(孟慧等,2013)。另一方面,理事长对每户社员家庭的了解程度显然无法直接影响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从而确保该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性。由此,满足“与主要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与因变量无联立相关”“与其他解释变量无显著相关”的选取原则(陈强,2014)。同时,为确保工具变量选取与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进一步对其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并同时采用2SLS与LIML模型进行估计。②倾向得分匹配法(PSM)。PSM作为稳健性检验方法用以降低样本选择问题所带来的内生性偏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广泛应用。因此,本文借鉴王刚刚等(2017)研究方法,采用PSM针对自选择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领导力评分将数据样本划分为处理组与对照组,评分高于“较强水平(4分)”的数据样本作为处理组,反之,则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选择理事长个体特征、村庄经营环境等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计算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进一步地,本文将基于贫困程度变量进行情景稳健性检验,通过计算不同贫困程度下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影响的ATT值,检验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与贫困程度的相关性。

(3)行为机制测度。为进一步估计领导力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行为机制,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Benefits_i = \gamma_1 + a_1 Leadership_i + \sum_{j=1}^n \lambda_j x_{ij} + \mu_1 \quad (22)$$

$$MED_{im} = \gamma_2 + b_1 Leadership_i + \sum_{j=1}^n \lambda_j x_{ij} + \mu_2 \quad (23)$$

$$Benefits_i = \gamma_3 + c_1 Leadership_i + c_2 MED_{im} + \sum_{j=1}^n \lambda_j x_{ij} + \mu_3 \quad (24)$$

其中, $Benefits_i$ 指第 $i$ 个合作社的产业扶贫绩效, $Leadership_i$ 为合作社理事长的领导力, $MED_{im}$ 表示领导力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第 $m$ 项中间机制,即合作社理事长在市场开发、产业学习与行业合作方面的行为表现; $x_{ij}$ 表示同时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各项控制变量, $\gamma_n$ 与 $\mu_n$ ( $n=1,2,3$ )分别表示截距项与随机误差项。(22)式中 $a_1$ 为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系数。(23)式中 $b_1$ 表示领导力对行为机制的影响系数, $c_1$ 是控制了中间机制的影响后,领导力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c_2$ 是控制了自变量的

直接影响后,中间机制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将(23)式代入(24)式求得中介效应,即中间机制作用。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机制效应之间关系为: $a_1=c_1+b_1c_2$ 。

## 2.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第6期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监测数据。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扶贫研究院于2018年7月至10月监测发布的合作社产业扶贫有效性调查。研究样本覆盖贵州乌蒙山、甘肃六盘山和四川大凉山等深度贫困山区,具体包括四川凉山自治州美姑县、布拖县、金阳县和昭觉县,泸州市古蔺县和叙永县;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和织金县,遵义市赤水市、习水县、桐梓县;甘肃临夏自治州东乡县和永靖县,平凉市庄浪县与静宁县,武威市古浪县,定西市通渭县、陇西县、渭源县、岷县、安定县和临洮县,庆阳市环县、华池县、正宁县与合水县,天水市张家川县等3省27县400余村,平均每县资助产业扶贫合作社20家左右。专家组基于完全随机抽样方法,从上述27县的每个县中随机抽取2—3家项目内合作社、2家项目外合作社,共计抽取125家合作社,进行产业扶贫有效性监测评价。合作社整体以村或以乡为单位成立,理事长通常由第一书记、村支书或村民委员会主任担任。监测评价工具包括世界银行提供的METT(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专家量表、合作社扶贫有效性问卷、理事长评价量表以及农户收入调查等。数据样本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合作社产业扶贫现状特点与领导者的人力资本状况,具有很好的样本代表性。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领导力的测度,采用基于五力模型的领导力监测评价分数,由专家通过Likert量表对理事长领导能力进行五级评分,包括对感召力、前瞻力、决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评价分数,并按同一权重加权平均求得领导力的总体评价分数。同时,选取理事长十分了解的贫困社员农户家庭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以充分反映理事长对社员家庭的了解程度。对于资金援助水平的测度,采用合作社期初资本即建设初期投入的固定资产值衡量。样本合作社初期投建均受到世界银行项目或其他扶贫专项资金资助,且成立运营周期大都处于3—4年期间,以期初资本作为代理变量可以使资金援助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能够较好地观察到。对于产业扶贫绩效的测度,采用合作社产业扶贫带动贫困农户的增收比例作为代理变量。同时,选取所调研村庄的经济发展相对水平作为情景检验变量,以观察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与贫困深度的相关性。针对领导行为机制的测度,采用理事长自任职以来在市场开发、产业学习、行业合作等方面的行为频率调查数据。此外,为更好地观测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选取理事长人口统计学特征、村庄环境以及合作社经营情景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从数据样本的统计特征看:①理事长个体特征。理事长基本为男性,占90%以上,年龄呈正态分布且相对年轻的特征,40岁以下的理事长占比31.2%,40—50岁理事长占47.2%,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理事长接近1/4。②合作社产业经营特征。伴随国家对贫困山区扶贫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连片特困地区交通状况不断改善,灾害防范治理能力不断增强,高达81.6%的合作社交通环境较为便利或十分便利,68.8%的合作社近5年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不断减弱,57.6%的合作社所在村庄村民居住相对较为集中。③合作社资本存量与领导力统计特征。合作社在成立期初的平均资本存量水平为101.69万元,最高值为2100万元,为位于甘肃渭源县的扶贫合作社;领导能力方面,体现出领导力整体水平较高,决断力与影响力相对较强,前瞻力相对较弱的特征;领导力评价处于一般或一般以下的理事长有40人,占比32.0%。④产业扶贫绩效。23.2%的合作社带动入社农户增收比例达40%以上,32.8%的合作社带动增收比例在20%—40%之间,40.0%的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比例在10%—20%之间,但仍有4.0%合作社尚未能够带动农户增收。具体变量定义与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 四、实证检验:来自连片特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 1. 基准回归

本文同时采用 OLS 与 Ordered Logit 进行回归估计,分别回归分析了领导力和期初资本对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同时,为避免异方差问题所带来的估计无效性偏误,本文均采用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各模型的 F 统计量和 Wald 统计量检验均在 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其均通过了总体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2):①在 OLS 与 Ordered Logit 估计中,领导力水平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符号方向为正,这表明扶贫干部的领导力显著促进了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的提升。②在两模型估计中,合作社期初资本分别在 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符号方向均为正,表明对合作社期初发展进行资金援助能够显著促进其产业扶贫绩效。但是,在 OLS 与 Ordered Logit 估计中,期初资本的影响系数均小于领导力的影响系数,即在合作社建设初期,领导力水平对产业扶贫绩效的促进效应相对高于资金援助。这表明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初期,以领导力投入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援助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或相对更高,从而佐证了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早期采取加大对人力资本援助投入的援助结构是更有效率的这一理论观点。

##### 2. 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检验。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针对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工具变量选取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针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3):其 F 统计量检验值高于 10,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陈强,2014)。

在此基础上,针对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并同时采用 2SLS 和 LIML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模型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4)。①在 2SLS 模型估计中(模型 3),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仍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符号方向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表明剔除内生性影响之后,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促进效应依然成立。同时,相对于 OLS 基准回归,其影响系数有所提升,这表明在剔除内生性影响之前,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贡献效应或被低估。②在 LIML 模型估计中(模型 4),其影响系数和稳健标准误与 2SLS 估计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表明估计结果并未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具有可信性(陈强,2014)。

(2)PSM 检验。在此基础上,基于 PSM 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 NNM 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匹配,为确保匹配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针对匹配结果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5):①匹配后模型中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偏误绝对值均处于 20 以下,表明对照组的协变量具有更接近于处理组的特征;②匹配后各协变量 t 值的绝对值均变化至 1.64 以下(p 值高于 0.1),均高于置信度,表明控制了协变量的异质性。匹配结果在整体上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下面估计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并针对 ATT 值在不同贫困程度下进行情景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①领导力对扶贫绩效影响的 ATT 值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符号方向为正,这表明领导力水平较高的处理组的产业扶贫绩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即领导力对合作社产业扶贫绩效具有正向贡献效应。②领导力对扶贫绩效的影响效应,在贫困程度相对最轻、相对较低与相对较高的三种贫困情景下均表现显著,且伴随贫困程度的加深,领导力对扶贫绩效影响的 ATT 值不断升高。这表明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贡献效应伴随贫困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增大,即贫困程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分类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产业扶贫绩效	合作社产业经营带动农户收入的增长比例;0%=1;1%—10%=2;11%—20%=3;21%—30%=4;31%—40%=5;41%以上=6	3.9760	1.4722
主要解释变量	扶贫干部领导力	领导力监测评价中五力(感召力、前瞻力、决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加权平均分数。五力具体测度如下所示:	4.1664	0.4820
	感召力	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总是能获得贫困农户信任并吸引社员追随等;很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很强=5	4.2000	0.6325
	前瞻力	能够较好地着眼于合作社未来发展,对其产业发展做出较为准确预测和把握等;很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很强=5	3.9760	0.7533
	决断力	对于经营决策、合作社管理处事决断,总是能果断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等;很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很强=5	4.2720	0.5916
	控制力	能够较好地控制合作社组织和产业经营的发展方向、战略实施过程及成效等;很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很强=5	4.1120	0.5895
	影响力	能够有效地影响社员和其他合作社(村)干部的行为及其工作情景等;很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很强=5	4.2720	0.5848
	期初资本	合作社成立期初的固定资本折现值:包括流水线、厂房、加工、包装、冷藏、运输等专用设备的资产净现值(单位:万元)	101.6852	294.8620
中介变量	市场开发	竭尽所能为合作社所经营的产业和产品识别更多市场需求,开辟新的市场;没有=1;很少=2;一般=3;较多=4;经常=5	4.0000	0.8764
	产业学习	常会参观学习同产业内其他合作社、企业等同行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没有=1;很少=2;一般=3;较多=4;经常=5	4.2880	0.8081
	行业合作	时常关注行业伙伴信息,并从中发现合作的机会;没有=1;很少=2;一般=3;较多=4;经常=5	4.0400	0.8429
工具变量	社员熟知度	对村里多少贫困社员农户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20%以下=1;21%—40%=2;41%—60%=3;61%—80%=4;81%以上=5	4.1520	1.0663
分组变量	贫困程度	本村在本乡镇/街道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好=1;中等偏上=2;中等=3;中等偏下=4;最弱=5	2.6480	1.2017
控制变量	年龄	理事长年龄实际值	43.7440	9.2294
	受教育程度	理事长受教育程度:未接受正式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5;本科及以上=6	3.6400	1.0837
	务工经历	理事长是否有外出工作经历;没有=0;有=1	0.8400	0.3666
	交通便利度	本村道路(柏油、水泥、土路等)不方便;非常方便=1;比较方便=2;一般=3;较不方便=4;非常不方便=5	1.9040	1.0690
	居住集中度	村民居住是否集中;不集中=1;不太集中=2;一般=3;较为集中=4;非常集中=5	3.2720	1.1958
	经营制度建设	合作社是否有制定有关严格保证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规章制度;没有=0;有=1	0.8720	0.3341
	财税补贴	合作社经营是否受到各级财税补贴;没有=0;有=1	0.5520	0.4973
	村务工情况	本村劳动力中外务工人员占比;50%以上=1;41%—50%=2;31%—40%=3;10%—30%=4;10%以下=5	3.4160	1.1327
	自然灾害	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近5年来变化情况;增加=1;不变=2;减少=3	2.5280	0.7545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1(OLS 估计)		模型 2(Ordered Logit 估计)	
领导力	0.5992(0.2788)**	领导力	0.8254(0.3737)**
期初资本	0.0007(0.0003)**	期初资本	0.0008(0.0005)*
年龄	-0.0111(0.0161)	年龄	-0.0143(0.0221)
受教育程度	0.3019(0.1216)**	受教育程度	0.4018(0.1715)**
务工经历	-0.1436(0.3406)	务工经历	-0.1781(0.4335)
交通便利度	-0.0056(0.1271)	交通便利度	-0.0619(0.1620)
居住集中度	-0.0947(0.1227)	居住集中度	-0.1588(0.1704)
经营制度建设	1.3028(0.3893)***	经营制度建设	1.6806(0.5384)***
财税补贴	-0.2567(0.2660)	财税补贴	-0.3935(0.3478)
村务工情况	-0.0324(0.1218)	村务工情况	-0.0838(0.1793)
自然灾害	-0.0273(0.1661)	自然灾害	-0.0660(0.2278)
F 检验值	2.93	Wald 卡方值	25.80
R <sup>2</sup>	0.1824	Pseudo R <sup>2</sup>	0.0607
N	125	N	125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表 3 弱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R <sup>2</sup>	Adjusted R <sup>2</sup>	Partial R <sup>2</sup>	Robust F(1, 113)	Prob > F
领导力(IV:社员熟知度)	0.3379	0.2735	0.2056	22.9338	0.0000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模型 3(IV-2SLS 估计)		模型 4(IV-LIML 估计)	
领导力	1.2361(0.6029)**	领导力	1.2361(0.6029)**
期初资本	0.0007(0.0003)**	期初资本	0.0007(0.0003)**
年龄	-0.0223(0.0184)	年龄	-0.0223(0.0184)
受教育程度	0.3010(0.1196)**	受教育程度	0.3010(0.1196)**
务工经历	-0.2434(0.3513)	务工经历	-0.2434(0.3513)
交通便利度	0.0240(0.1247)	交通便利度	0.0240(0.1247)
居住集中度	-0.0942(0.1166)	居住集中度	-0.0942(0.1166)
经营制度建设	1.3276(0.3850)***	经营制度建设	1.3276(0.3850)***
财税补贴	-0.2877(0.2656)	财税补贴	-0.2877(0.2656)
村务工情况	-0.0456(0.1135)	村务工情况	-0.0456(0.1135)
自然灾害	-0.0550(0.1603)	自然灾害	-0.0550(0.1603)
Wald 卡方值	38.03	Wald 卡方值	38.03
R <sup>2</sup>	0.1462	R <sup>2</sup>	0.1462
N	125	N	125

度越深的地区,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愈大。此外,在贫困程度相对最轻的地区,领导力影响的 ATT 估计为负值。对于这一“反常”的估计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扶贫地区,产业发展及其可分配资源相对较高,理事长影响力、控制力等领导方面能力过强,可能

会进一步便于其控制合作社的产业资源与分配方式,从而也为其将更多的绩效分配向私人团体倾斜提供了便利,或不利于社员收入的提升(马华,2018)。

表 5 平衡性检验

协变量	匹配状态	处理组	对照组	偏误(%)	降低偏误(%)	t 值	p 值
年龄	匹配前	45.6920	40.5110	58.5	95.8	3.13	0.002
	匹配后	44.5480	44.3290	2.5		0.17	0.868
务工经历	匹配前	0.8333	0.8511	-4.8	-131.8	-0.26	0.795
	匹配后	0.8219	0.8630	-11.2		-0.68	0.499
交通便利度	匹配前	1.8333	2.0213	-17.7	63.6	-0.95	0.345
	匹配后	1.8630	1.7945	6.5		0.42	0.674
村务工情况	匹配前	3.5256	3.2340	26.0	71.8	1.39	0.166
	匹配后	3.4658	3.3836	7.3		0.45	0.652
自然灾害	匹配前	2.6026	2.4043	25.8	100.0	1.42	0.157
	匹配后	2.5753	2.5753	0.0		0.00	1.000
贫困深度	匹配前	2.7821	2.4255	30.2	96.2	1.61	0.110
	匹配后	2.7260	2.7397	-1.2		-0.07	0.942

表 6 ATT 总体估计与情景稳健性检验

变量	总体估计	贫困程度相对高	贫困程度相对低	贫困程度相对最轻
ATT	0.821**	1.188**	1.098**	-2.286***
标准误	0.405	0.538	0.516	0.421
t 值	2.027	2.207	2.127	-5.435

### 3. 行为机制分析

本文分别将市场开发、产业学习和行业合作作为中间机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各模型总效应估计 F 统计量均在 5%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通过了总体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 5—模型 7 中,总效应估计均在 5% 水平上显著,这与前文估计相一致,即扶贫干部领导力显著促进了产业扶贫绩效增长,中间机制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

模型 5 中,领导力对市场开发行为的影响效应  $b_1$  和市场开发对产业扶贫绩效的影响效应  $c_2$  均在 5% 水平上显著,二者符号方向为正。这表明市场开发机制的中介效应成立,即领导力较高的扶贫干部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市场开发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产业扶贫绩效提升。

模型 6 中,领导力对产业学习的影响效应  $b_1$  和产业学习对扶贫绩效的影响效应  $c_2$  分别在 10% 与 5%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领导力对扶贫绩效的促进效应存在以产业学习为中间机制的中介效应,即具有较高领导力的扶贫干部更可能积极带领合作社进行技术、经营方面的产业学习,从而进一步提高经营能力,提升产业扶贫绩效。

模型 7 中,领导力对行业合作的影响效应  $b_1$  和行业合作对扶贫绩效的影响效应  $c_2$  均在 5% 水平上显著,表明领导力对扶贫绩效的促进效应存在以行业合作为中间机制的中介效应,即领导力水平较高的扶贫干部,会更有能力或更倾向于寻求和把握行业合作机会,通过“报团取暖”的方式提高产业扶贫能力和绩效水平。在此基础上,中间机制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市场开发>产业学习>行业合作,三者的机制作用处于较为接近水平(见表 7)。



表 7 行为机制分析

变量	模型 5(市场开发)	模型 6(产业学习)	模型 7(行业合作)
总效应( $a_1$ )	0.5993(0.2846)**	0.5993(0.2846)**	0.5993(0.2846)**
领导力对行为机制的影响效应( $b_1$ )	0.4130(0.1784)**	0.2979(0.1642)*	0.3506(0.1716)**
行为机制对扶贫绩效的影响效应( $c_2$ )	0.3223(0.1476)**	0.4087(0.1591)**	0.3214(0.1538)**
直接效应( $c_1$ )	0.4662(0.2865)	0.4775(0.2818)*	0.4866(0.2856)*
中介效应( $b_1c_2$ )/Bootstrap 检验值	0.1331(0.0790)	0.1218(0.0942)	0.1127(0.0856)
中介效应占比( $b_1c_2/a_1$ )(%)	22.2125	20.3159	18.8034

注: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归纳四点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实践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巨大成效,资金援助与人力资本援助相嵌入的优化援助结构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投入大量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高水平人力资本,形成优于一般国家的要素援助结构,满足了贫困地区发展早期对人力资本改善和投入的发展需求,扩大了资本援助的减贫效应。②扶贫干部领导力对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贫困程度越深,促进效应越大。③扶贫干部领导力对产业扶贫的促进效应,存在以市场开发、产业学习和行业合作为主的中间行为机制。④在贫困地区发展早期,对人力资本改善的援助投入率应高于资金援助的投入率,否则易陷入“福利陷阱”,即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有效开发利用相对较高的资金援助,反而将其用于消费,带来资本援助的低效率;发展中后期则反之,否则易陷入“内卷化陷阱”,即较高的人力资本在较低资本存量水平上进行生产,使得劳动的边际报酬不断降低,带来产业经营的内卷化和低效率。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建设内容,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重要方案。然而,鉴于深度贫困地区在自然条件、市场环境、投资意识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特殊性,这一时期针对其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和乡村振兴建设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启示:

(1)继续坚持和完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制度在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中的制度安排和重要作用。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将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作为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的基层抓手和建设力量,充分发挥其在产业发展中的带头作用,并带动贫困居民参与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注重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干部供给,运用政策激励手段加强人才引进,优化扶贫干部配比,充分发挥扶贫干部领导力在人力资本劳动产出与产业扶贫绩效中的作用。

(2)加强基层帮扶干部领导能力培训,提高其在市场开发、产业学习和行业合作方面的意识和能力。要注重培养扶贫干部在前瞻力、控制力、决断力等方面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同时,充分发挥贫困片区产业组织带头发展的正外部性,加强合作社等产业组织之间先进管理经验、激励机制与生产技术的产业学习,提高产业扶贫干部和产业组织“抱团取暖”、合作参与市场经营的机会和能力,提升其开辟新市场的能力,通过提高扶贫干部准确高效的领导行为,有效提升产业发展绩效水平。

(3)在贫困地区帮扶和乡村振兴建设中重视要素投入的结构完善和动态调整。对于落后乡村的发展援助和投资建设,在进行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其人力资本的改善投资和下派驻村干部人力资本帮扶。进一步,要注重对要素投入和发展投资的结构调整与援助结构的动态优化。在贫困地区发展初期,加大对人力资本改善的投入力度,配合相应的发展资金援助;在发展中后期,加大对产业资金、工业资本的援助投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同时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改善援助。

[参考文献]

- [1]曹仰锋,吴春波,宋继文.高绩效团队领导者的行为结构与测量: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7):131-144.
- [2]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9,(2):19-41.
- [3]陈国权,周为.领导行为、组织学习能力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09,(5):148-154.
- [4]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5]邓宏图,徐宝亮,邹洋.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经济研究,2018,(11):17-31.
- [6]郝大明.1978—2014年中国劳动配置效应的分离与实证[J].经济研究,2015,(7):16-29.
- [7]马华.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8,(5):136-159.
- [8]孟慧,宋继文,徐琳,田京,钱静.中国情境下变革型领导的内涵与测量的再探讨[J].管理学报,2013,(3):375-383.
- [9]倪大钊,徐志毅,钟超,宫钰.“先锋”与“后盾”:个体资本、单位层级与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72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4):126-139.
- [10]曲承乐,任大鹏.合作社理事长的商业冒险精神与社员的风险规避诉求——以北京市门头沟区AF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8,(1):28-39.
- [11]任胜钢.企业网络能力结构的测评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1):69-80.
- [12]舒全峰,苏毅清,张明慧,王亚华.第一书记、公共领导力与村庄集体行动——基于CIRS“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8,(3):51-65.
- [13]汪晨,万广华,吴万宗.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J].中国工业经济,2020,(1):5-23.
- [14]王刚刚,谢富纪,贾友.R&D补贴政策激励机制的重新审视——基于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7,(2):60-78.
- [15]王亚华,舒全峰.第一书记扶贫与农村领导力供给[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1):82-87.
- [16]谢小芹.“接点治理”: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6,(3):12-22.
- [17]谢小芹.“双轨治理”:“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广西圆村的田野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3-62.
- [18]谢洪明,罗惠玲,王成,李新春.学习、创新与核心能力:机制和路径[J].经济研究,2007,(2):59-70.
- [19]杨晓婷,陆镜名,刘奕辰,于滨铜.“资本下沉”赋能“资源释放”: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村脱贫的行动逻辑与高效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20,(6):49-67.
- [20]张国磊,詹国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名实分离与治理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5-32.
- [21]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领导力五力模型研究[J].领导科学,2006,(9):20-23.
- [22]Banerjee, A. V., and E. Duflo.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 [23]Liu, F. and H. Makoto. Leadership's Function i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By the Case of “Rabbit King” in Western China[R]. IEEE, 2010.
- [24]Kuada, J. Culture and Leadership in Africa: A Conceptual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 [J].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Studies, 2010,1(1):9-24.
- [25]Lewis, O. The Culture of Poverty[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4):19-25.
- [26]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22(1):3-42.
- [27]Maak, T., and N. Stoetter. Social Entrepreneurs as Responsible Leaders: “Fundación Paraguaya” and the Case of Martin Burt[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111(03):413-430.
- [28]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9]Park, A. and S. Wang.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94(9-10):790-799.
- [30]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5):1002-1037.
- [31]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1):1-17.
- [32]Sen, A. K.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33]Sherraden, M.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1.
- [34]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6.

## Aid Structure, Leadership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YU Bin-tong<sup>1</sup>, WANG Zhi-gang<sup>1</sup>, ZHU Jia<sup>1</sup>, HOU Yun-xiao<sup>2</sup>

-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ropose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practice point of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grassroots poverty alleviation cadres’ leadership abilit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m in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in deeply impoverish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d structure. The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poverty trap” and the efficient spatial S-shaped aid structure in the deeply impoverished areas by constructing regional economy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dissects the con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leadership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ts contribution and poverty depth. Finally, the empirical test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data of 125 random sampling cooperatives in 27 counties of 3 provinces 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d structure of which capital aid and human capital input are mutually embedded and the leadership poverty alleviation of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The leadership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adr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intermediate behavior mechanisms of market development, industry learning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the deeper the poverty, the greater the contribution of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poor areas, the investment rate of human capital assistance improvement should be higher than that of capital assistance, otherwise it will fall into the “welfare trap”; in the middl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opposite is true, otherwise it will fall into “involution trap”.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 of China’s village cadre system in the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aid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velopment idea for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ade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an institutional path to effectively link the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deeply impoverished areas; leadership;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id structure; poverty trap

**JEL Classification:** D24 I32 M21

[责任编辑: 覃毅]